

动态

新时期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

——“2014 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高层论坛”纪要

黄 洁

2014 年是中澳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年。11 月 15 日至 16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并于 17 日在堪培拉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决定将中澳关系提升为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宣布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该举措标志着两国经贸关系更上了一层楼。

在此背景下,2014 年 12 月 5 日—7 日,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了“2014 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高层论坛”,论坛邀请了国内 10 多个省市的 50 多位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及部分国际知名的澳大利亚专家共聚一堂,交流各自的最新学术成果,探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方法,以推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论坛分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两部分。

在 12 月 6 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中,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教授、阿德莱德大学的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的陈正发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王光林教授和武汉大学的黄忠教授分别用英文作了题为“跨国澳大利亚”、“亚雷克西斯·赖特之重要性”、“帕特里克·怀特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几点反思”、“碎片翻译:布莱恩·卡斯特罗《上海舞》中的迷失”和“流散者的对话:早期澳大利亚华人写作中的语言、读者与政治”的主旨发言。阿什克罗夫特教授指出,全球范围内流动性的增强在日益关注边界问题的当今,格外受后殖民文化批评家的关注。“澳大利亚主义者”(Australianists)开始在跨越边界和流动性的场景下探究澳大利亚的国家地位,既通过跨越澳大利亚的真实国土,又通过澳大利亚写作来研究跨国身份。流动性和跨越边界正是所谓的“国家”的固有现象,因此他提倡“跨国”(Transnation)这一概念,以强调流动、迁徙等外部特征正是从国家内部展开的。周思教授指出,澳大利亚土著作家亚雷克西斯·赖特的创作对澳大利亚文学做出了变革性的贡献,影响了人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想象澳大利亚社会的方式。赖特的代表作《卡彭塔里亚湾》深得土著故事叙述传统的精髓,又从拉丁美洲、爱尔兰和中国的观念中汲取了营养,从而打破了澳大利亚文学的界限,甚至改变了人们对澳大利亚本身的认识。陈正发教授指出,澳大利亚

文学巨匠帕特里克·怀特自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评论界的视野以来,一直是国内学者密切关注的对象。怀特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上的不均衡和互相重复、机械地套用理论、单纯地顶礼膜拜、研究内容存在问题等,因此当务之急应当是对怀特研究提供适当的指导,以保证研究的总体质量。王光林教授认为瓦特·本雅明关于翻译和碎片的洞见对于阐释布莱恩·卡斯特罗的《上海舞》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21世纪的翻译理论适用于全球化的移民经历,从而滋生了不同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实践的另一种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书写。黄忠教授认为,尽管华裔澳大利亚写作已成为澳洲最大的流散写作的派别之一,在过去的15年间深受评论界的关注和肯定,但作者之间的文化、语言和社会差异这些重要考量因素却常常受到忽视。因此有必要研究移民历史和文化联系是如何形塑写作的,并且要尤其关注语言选择和目标读者的问题。

12月6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主要围绕作家作品分析展开。与会学者围绕澳大利亚经典作家作品、土著作家作品、新锐作家作品等展开了深入讨论。安徽大学的白曼曼借助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来剖析澳大利亚经典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的代表作《我的光辉生涯》中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苏州大学的华苏扬通过分析克里斯蒂娜·斯特德的《小旅馆》中流散于瑞士廉价旅店的一个异乡客群体,通过展现人物由于政治、经济或情感原因造成的生存境遇,指出困扰这一特定人群的焦虑感均源于失根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上海理工大学的杨永春从空间意象、空间叙事和诗歌节奏等方面解读了澳大利亚诗坛“第一位游吟诗人”查尔斯·哈珀的诗歌。上海理工大学的贾晓云分析了亨利·劳森的代表作《赶牧人之妻》中的丛林女性形象,认为这部短篇小说反映了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安徽大学的詹春娟通过聚焦亚雷克西斯·赖特的《卡彭塔尼亚湾》中的狂欢化特征,指出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意蕴、狂欢化表现和杂糅语言的使用,均为处于边缘的土著指明了未来的出路。江苏大学的吴庆宏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解读了澳大利亚土著作家马都鲁创作的第一部澳洲土著小说《野猫下坠》。华东师范大学的应琼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分析了当代土著作家拉里萨·贝伦特的处女作《家》。

此次论坛中最受关注的当代澳大利亚作家当属彼得·凯里、蒂姆·温顿和伊丽莎白·乔利。苏州大学的方红从分析作品中互文性、拼贴、非线性叙述这三个显著的后现代特征入手,来证明澳大利亚新派小说家彼得·凯里的小说《幸福》标志着澳大利亚小说写作的一个转折点。安徽大学的刘婷婷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理分析了彼得·凯里的短篇小说《人生之旅》。安徽大学的申梦萍从分析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真史》中的女性形象入手,来探讨女性如何在殖民统治和男权压迫的双重压制下找寻自我身份,实现自我救赎。苏州大学的黄洁从重写历史、对抗帝国压制和揭秘男性阳刚气质等角度分析了两部内德·凯利小说,指出吉恩·贝德福德的《凯特妹妹》和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真史》是澳大利亚作家重写本民族奠基性神话的典范。南通大学的张加生在对互文性概念进行追根溯源的基础上,指出彼得·凯里的《杰克·迈格斯》对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进行互文性再创作的目的在于对其进行戏仿与解构。安徽工业大学的徐在中指出蒂姆·温顿的《土乐》是一则关于人物的创伤与治疗的故事,小说再现了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白人的个体创伤和土著民族的集体文化创伤的双重创伤经验。安徽大学的朱蕴轶以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莱弗的地方理论为依托,围绕《浅滩》和《土乐》两部作品,从地方身份的建构和地方认同两个方面来剖析作者蒂姆·温顿的“恋地情结”。苏州大学的侯飞分析了蒂姆·温顿塑造的一批深受美国反文化运动影响的女性形象,指出在肯定变革、破除

文化自卑魔咒的前提下,坚持理性、反对激进是温顿对澳大利亚文化所持的核心观点。牡丹江师范学院的梁中贤教授提出,伊丽莎白·乔利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模式在写什么、怎样写方面突破了传统叙事的束缚,表现了传统文学排斥的微观对象,消解了宏大叙事所主张的民族英雄神话,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同样来自牡丹江师范学院的赵祥凤教授认为,乔利的作品充分表现了后现代时期多元文化的交织和碰撞对弱势文化个体造成的精神创伤。《克雷蒙特大街的报纸》、《牛奶与蜂蜜》、《井》等作品,都触及了因文化和地域的差异而导致主人公的身份错位与自我分裂。

除了凯里、温顿和乔利,小组讨论涉及的其他热点还包括大卫·马洛夫、亚历克斯·米勒、克里斯托弗·考什、尼古拉斯·周思、凯特·格伦维尔等新锐作家。苏州科技学院的孔一蕾指出,大卫·马洛夫在其作品《柯洛溪边的对话》中不仅对工具理性思维进行了批判,还向读者展示了主人公如何在澳大利亚的荒野中冲破工具理性的桎梏,最终实现了完整生存。安徽大学的杜燕萍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解读了澳大利亚当代作家亚历克斯·米勒的《石乡行》中体现的家园意识。西北师范大学的杨保林指出,克里斯托弗·考什在《迷失之声》中以个人故事表现民族历史,反思民族身份与“澳大利亚特性”,表达了澳大利亚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以及对“澳大利亚梦”的追求。南通大学的张丽丽指出,尼古拉斯·周思的《红线》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浮生六记》的创造性误读。在对这类作品进行解读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文本生成和接受的环境,才能欣赏到跨国文学的杂糅之美。安徽大学的梁静借助后殖民文化身份理论和杂糅理论解读了凯特·格伦维尔的殖民三部曲《神秘的河流》、《中尉》和《萨拉·索尼尔》。

综述类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笔耕不辍的前辈学者、浙江大学的朱炯强教授以读者、学者和译者的三重身份梳理了以多元化文化为基本特色的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历程,叙述了澳大利亚妇女文学在澳洲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描绘了澳大利亚研究在我国的发展过程和现状,也回顾了自己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认识和研究的经历。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晓映教授指出,尽管澳大利亚女性文学同英国女性文学一样,都曾被第二性的命运所困扰,但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经历,一方面减弱了其女性文学受英国女性文学影响所带来的焦虑,另一方面也在边缘地带为其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跨界的空间。琼州大学的陈卓梳理了当代澳大利亚生态小说的显著特征,并分析了一些重要作家如帕特里克·怀特、蒂姆·温顿、伦道夫·斯托等人作品中的生态主题。苏州大学的程颖洁以近四十篇当代澳大利亚散文作品为分析对象,从主题、风格、创作群体三个方面考察了当代澳大利亚散文的创作特点。上海理工大学的华燕以原型批评和后殖民批评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澳大利亚三个时期的短篇故事,指出男女两性关系原型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产生了某种流变,女性被动的角色正在向一个多元化的方向转变。

在文学和文化批评方面,苏州科技学院的陈振娇梳理了澳大利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麦克尔·怀尔丁的批评思想,指出其对澳大利亚“新批评”的批判体现了澳大利亚“新左翼”的典型特征。在比较文学方面,上海海关学院的安全勇指出,作为儿童文学创作者,澳大利亚作家索尼娅·哈特内特与中国作家曹文轩具有诸多相似之处,读者反映论的相关理论为两位作家身份的确认提供了有效的参照。女性文学研究新视角方面,西华大学的徐小琴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了伊丽莎白·哈罗尔的小说《遥远的展望》。

在12月7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中,迪肯大学的林·麦克雷登(Lyn McCredden)教授通过分析帕特里克·怀特、朱迪斯·赖特、里昂内尔·佛格迪、蒂姆·温顿、理查德·弗拉纳根等重要

作家的作品,来探讨澳大利亚文学中关于“失败”的表述背后的深层意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周小进教授提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澳两国文学的进程体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共同关注,尤其体现在两国都在国家主导下努力将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正典推向国际。从国家对文学的赞助制度、文学正典化过程中的审美问题和身份问题、创作空间和作家发展的影响等角度对中澳两国该阶段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将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上海交通大学的彭青龙教授分析了彼得·凯里的《幸福》和《偷窃一个爱情故事》中的伦理思想,认为这两部伦理主题小说颠覆了传统的道德思维模式,体现了作者超越二元、以人为本的伦理观。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弘教授通过集中关注蒂姆·温顿小说中对澳大利亚西部的表达和研究温顿笔下的西部意象,来凸显其“澳大利亚性”的主要特征。河北师范大学的马丽莉教授通过分析布莱恩·卡斯特罗的新作《园书》中的中国元素,指出卡斯特罗对中澳文化的融合持谨慎的态度:尽管小说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屡次试图融合,但融合的前景就如同男女主人公早夭的爱情结晶那样不容乐观。苏州大学的王腊宝教授集中分析了中澳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著名个案:中国首批赴澳九名学者和他们当时的导师里欧妮·克拉默教授所引起的评论界的争议。澳大利亚学者彼得·普格斯利在其近作中表达了对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的不满,认为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始终被马克思观念所统辖,并将这一状况归结于某一、两位“九人帮”成员的关系网的影响。然而,通过回顾“九人帮”的传说和审视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现状,不难发现克拉默所产生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中国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更多的是各方面的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

为了促进两国学者之间的相互理解,组委会还于 12 月 6 日晚设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澳学者对话会”,与会学者围绕“中国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和中澳文学关系”展开热烈讨论。这样的非正式交流有助于澄清一些固化的误解、加深对彼此的正确认识,也有利于拓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将来发展的思路。

本次论坛集中了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其中包括我国首批赴澳深造的九名学者中的黄源深教授和王国富教授。其间各项活动均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是近年来颇为难得的一次澳大利亚文学方面的盛会。论坛总结了新时期的中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也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将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陈言)